

#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4年第4期（总第29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4年6月

## 中心动态

- 2024年美国教师来黔人文交流团走进铜仁职业技术学院……2
- 我院举行2024年国际学生毕结业典礼……4

## 东盟资讯

- 中国—东盟（马来西亚）新兴产业大会在吉隆坡举行……6
- 澜湄视听周面向南亚扩大“朋友圈”……6
- 中国—东盟中心启动缅甸官员中文培训班……7
- 近百名马来西亚学员广西学习高铁技术……8
- 2024中国高等教育展助推中泰两国教育交流合作……10
- 中国—缅甸纺织服装现代工匠学院2024年缅甸纺织服装师资培  
养培训班开班……11

## 国别研究

- 融入与共生：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变迁探析……13

## 热点分析

- 如何从东盟的角度看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31

## ◎中心动态

### 2024年美国教师来黔人文交流团走进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近日，由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桥见”贵州，多彩如你——2024年美国教师团来黔人文交流学习活动在贵州举行。

6月19日，美国教师来黔人文交流团一行到我校参观访问，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代表学校对远道而来的美国教师来黔人文交流团表示热烈欢迎。她指出，中美人文交流是深化友谊和促进双方民心相通的重要形式，希望交流团一行在校参观访问期间，深入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和职业技术技能的内涵韵味，以人文交流构筑中美友好合作之桥。随后，交流团一行在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外事办主任徐瑶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他们先后实地走访了国际教育学院、“五元文化”墙、经管学院电商直播室、农学院动物诊疗中心等教学和实训场所。

在医学院中医康复馆，交流团一行饶有兴致地体验了古老而神奇的中医推拿疗法。医学院孙再慧、田玲玲两位老师推、拿、提、捏、揉、点、拔、按，使嘉宾们感到身体放松、舒适。一起参与的国际学生们还有样学样，模仿老师们的滚揉手法，互相按摩。在农学院，交流团和我校国际学生一起体验了中式插花、中式茶艺展示。农学院王娟老师以碗花为例演示了中国传统插花花型的骨架（主枝、客枝、使枝）及其在作品中的处理，在学生的协助下，嘉宾们修剪枝叶、固定花枝，一起感受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触觉之美。最后，交流团一行还体验了中式茶艺表演，农学院陈玲老师带领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学

生们带来梵净绿茶玻璃杯茶艺、抹茶三汤点茶和七汤点茶茶艺展示。年轻的茶艺师们温盏、投茶、冲泡、奉茶，嘉宾们在宁静雅致的氛围中赏茶艺、品香茗，细细品味梵净绿茶和贵州抹茶独特的幽香，一同感受了中式茶艺之美，黔茶之茗香，尽显中国人文韵味、极致风雅的生活美学。

来自美国米德尔塞克斯中学的Zhenyan Xue Li表示，她非常喜欢我校开设的文化体验课程。作为一名海外中文教师，她将向所教授的学生推介我校的汉语课程和各类中国传统文化体验课程。

来自邦杜兰特法拉高中Rebecca Jingye Baucum表示，铜仁职院的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美国青少年很喜欢自己动手，这里的宠物治疗中心、中医课程等对美国青少年有很强的吸引力。

来自伯克利高中的Xin Chen表示贵州职业教育的发展令人瞩目。

我校整洁优美花园式的校园环境让她享受其中，她印象最深的是茶艺展示及品茗课程。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应邀访美期间提出的“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教育部设立“美国青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Young Envoys Scholarship，以下简称YES项目），旨在遴选全国各地各校优质来华交流项目，促进中美两国人文交流。我院积极组织申报工作，汉语中短期学习项目成功获批，成为YES项目首批公布的院校，也是贵州省唯一获批此项目的高校。

我校将以此次2024年美国教师来黔人文交流团来访为契机，积极开展YES项目宣传，为美、法、欧洲青年来华交流学习提供特色中

文教育课程和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向世界展示贵州职教名片，打造“留学铜职”国际教育品牌。（来源：国际教育学院）

### 我院举行 2024 年国际学生毕结业典礼

7月9日，我院在药学院报告厅举办了2024年国际学生毕结业典礼，学院党委副书记杨海英，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院长邓振华、副书记龚长鑫、各科室负责人、国际中文教研室教师代表、在校毕结业的50余名国际学生参加了典礼。

典礼开始前大家通过PPT观看了国际学生风采展示，回顾了同学们在校期间点点滴滴的美好记忆。典礼由代亚松主持，他向在场国际学生介绍了到场的领导及老师。教师代表刘江涛老师首先肯定了各位同学汉语学习的成绩，又从专业汉语教学的角度，指出同学们在汉语学习中的不足，希望他们勇于翻山越岭探索汉字之美。辅导员尚厚玉老师发言的主题是“hello and say goodbye”，和大家相聚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每个同学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非常欣慰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和取得的成绩。在场师生一起观看了部分学生代表录制的结业感言，来自越南、巴基斯坦、赞比亚的同学们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在铜仁职院学习的感受，对老师的辛勤教育和帮助深表感激。现场来自加纳的亚克和大家分享了他在铜仁职院学习的感受，他认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学校，老师们关心学生、倾心教学，在这里的学习经历充实而难忘。

邓振华院长为国际学生们送上祝福和离别寄语，愿他们在新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为自己国家发展、世界和平与友谊贡献

力量。同时也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希望，一是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二是勇敢面对困难和挫折、三是向世界介绍真实、客观、美丽的中国。同时也欢迎同学们随时回家，经常回到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走一走，看一看！

来自9个国家的十名国际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勇于拼搏、乐于助人，获得了今年的“十佳国际学生”荣誉。领导和老师们为今年毕结业的国际学生发放了毕结业证书和纪念品。

全体师生在体育馆前合影留念。毕结业典礼在热烈、温馨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来源：国际教育学院）

## ◎东盟资讯

### 中国—东盟（马来西亚）新兴产业大会在吉隆坡举行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消息，6月5日，中国—东盟（马来西亚）新兴产业大会在吉隆坡举行。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工业部副秘书长哈纳菲等出席活动并致辞。

欧阳玉靖表示，中马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与合作，为区域互利合作树立了典范。近年来，中国对马投资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并逐步延伸至新兴领域，预计未来双向投资将更加强劲。

史忠俊表示，目前中马都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本次活动将积极探索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助力东盟与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哈纳菲表示，中国为促进东盟经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明年起马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希与中国在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新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经济可持续繁荣发展。（来源：东盟头条）

### 澜湄视听周面向南亚扩大“朋友圈”

第五届澜湄视听周17日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澜湄六国及南亚多国的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主流媒体机构400余名代表参与。

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澜湄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优秀广播电视作品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属性，成为促进澜湄各国民心相通的金色桥梁。

据第五届澜湄视听周组委会副主任、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盛高举介绍，2020年诞生的澜湄电视周于2022年更名为澜湄视听周，共举办23个系列活动，143部、277集中外优秀视听作品在多国逾60个平台展播。

澜湄视听周影响力和传播力逐年提升的同时，还持续扩大“朋友圈”。继2023年首次邀请南亚国家参与后，今年邀请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主流媒体代表出席活动。

第五届澜湄视听周以“山水相依·‘遗’传佳画”为主题，旨在通过呈现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进各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让各国文明在合作中传承，在合作中创新，在合作中发展。

第五届澜湄视听周将举办优秀视听节目展播、第三届青年短视频创作营、视听交流对话、“最美中国·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参访、“视听中国·走进越南”优秀中国电视剧越南展播等系列活动。（来源：中新社）

### 中国—东盟中心启动缅甸官员中文培训班

2024年6月13日下午，首届缅甸官员中文培训班开班仪式顺利举行。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缅甸外交部常秘吴昂觉莫、战略研究和培训司司长佐漂温、东盟司司长钦迪达埃，缅甸驻华使馆副馆长梭珊蒂佐，中文联盟主席王锦红出席开幕式。

此次培训班面向缅甸外交部、投资与对外经济关系部和商务部27名政府官员开展线上汉语教学，旨在提升学员汉语水平，服务中

缅甸及中国东盟务实合作。

史忠俊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中缅胞波友谊以及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他希望以语言为媒，通过本次培训让学员们不仅更好掌握汉语，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发展，成为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和务实合作的桥梁。

吴昂觉莫回顾了史忠俊秘书长去年成功访缅，并表示，学术和教育交流在缅中两国合作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领域。中国—东盟中心长期重视推动双方开展相关领域合作。本次中文培训班将帮助缅方培养合格、熟练的中文口译与笔译人才，将成为进一步深化缅中友谊的宝贵财富。

王锦红表示中文联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化云服务平台，服务 162 个国家的 1000 多万用户。王还向缅学员们介绍了本次培训班的教学计划。

缅甸外交部规划与行政司处长叶佐敏作为学员代表发言，感谢中国—东盟中心举办培训，表示学员们将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未来更好为缅中交流与合作服务。

开班仪式后，学员们参加了培训班开班课，学习了中文语言体系和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的文化背景。（来源：东盟头条）

### **近百名马来西亚学员广西学习高铁技术**

6月24日，91名马来西亚学员在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简称“柳铁职院”）体验模拟开高铁，学习铁路相关技术。

今年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 50 周年暨“中马友好年”。作为正



在建设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简称“马东铁项目”)合作伙伴,柳铁职院于本月 24 日至 29 日,邀请来自马来西亚院校、企业的 91 名学员在该校近距离感受铁路文化、学习铁路相关技术、体验中华传统文化。

开幕仪式上,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法蒂尔·伊斯迈尔表示:“我们一贯鼓励像今天这样的交流,该活动为双方提供坐在一起交流意见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马中两国关系。”

马来西亚一所大学的学生邱立人首次体验中国高铁。他表示:“从南宁坐高铁到柳州,每小时速度 200 多公里,却仍然感觉很平稳。”他希望借此次机会,到中国进一步了解高铁,感受中国发展和变化。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教师卓树英表示,对我们学生而言,通过培训能学习到很多专业技术知识,了解铁路岗位实际应用。他说:“希望双方促成进一步合作,让马来西亚学生到柳州交换学习,双方共同培养铁路人才。”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马东铁项目,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项目线路全长 665 公里,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马来西亚东西海岸的交通大动脉,拉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作为中国专业铁路职业院校,柳铁职院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总经理部签署技术服务合同,为马东铁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与维护、本土化铁路人才培养提供解决方案,助力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去”。

当天,柳铁职院还与马来西亚交通部铁路发展公司、敦胡先翁大

学等 8 家院校、企业交流合作意向书文件，将在铁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产业开展技能培训、教学系统共建、技术服务、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闫炳辰表示，近年来广西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开放合作，成功举办 7 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搭建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一批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成效日益凸显。（来源：中新社）

### 2024 中国高等教育展助推中泰两国教育交流合作

2024 中国高等教育展 22 日在泰国曼谷吞武里大学举办，来自中国的 32 所高校参展，吸引众多泰国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交流。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教育交流合作是中泰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中国高等教育展是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泰国组织举办的首次大规模教育展，全面介绍展示中国数十所著名高校的招生、专业设置、培养方式等信息，是泰国各界特别是学校和师生们深入了解中国高校的一次难得机会，对促进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泰国副总理兼能源部长披拉攀致辞说，此次中国高等教育展有助于推进泰中两国教育交流合作，也为对赴华留学感兴趣的泰国青年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帮助他们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各类奖学金信息。

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团长张俊发言说，此次组织清华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32 所中国知名高校来泰办展，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夯实两国高校间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学生学者扩大双向流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国各高校展台展示了优质教育资源、先进科研成果、奖学金项目以及最新的留学政策等详细信息，吸引了大量泰国学子和家长前来咨询交流。

此次中国高等教育展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主办，曼谷吞武里大学承办。（来源：中新社）

### **中国—缅甸纺织服装现代工匠学院 2024 年缅甸纺织服装师资培养培训班开班**

6 月 27 日，中国—缅甸纺织服装现代工匠学院 2024 年缅甸纺织服装师资培养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8 位来自缅甸的纺织服装专业教师将在该校开启为期 3 个月的师资培训。

据悉，中国—缅甸纺织服装现代工匠学院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和缅甸工业部支持和指导下，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缅甸工业部第二培训中心(曼德勒)，以及相关企业合作共建的项目，目前已在缅甸曼德勒建成 3 间教学实训室，是专注于培养中国—缅甸纺织服装产业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罗生芳在开班仪式致辞时介绍，本次培训将组织来自该校文化与创意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中国国内纺织服装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还会安排企业跟岗实践、实地考察和交流活动，让缅甸的同仁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的

纺织服装产业和教育教学环境。希望通过本次培训，为缅甸的纺织服装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为两国在纺织服装产业的深入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缅甸工业部产业合作司司长吴妙乌在线上发表致辞。他指出，纺织服装工业是缅甸重要的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培训不仅为缅甸服装人才提供了继续教育的机会，也有助于缅甸服装产业工人掌握更加成熟的技术。希望本次培训为两国服装行业的发展创造契机。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罗耀光在致辞时表示，当前，广西正在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产教集聚示范区和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创新高地，搭建“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等多维交流平台。相信这次培训班将为广大缅甸教师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平台，也将为缅甸纺织服装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参加此次培训的缅甸教师在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后，还将参加服装缝纫工和服装制版师职业技能证书的考试。（来源：东盟头条）

## ◎ 国别研究

### 融入与共生：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变迁探析

陈俊源

(陈俊源，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 2021 级博士研究生，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

**摘要：**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发展演变为切入点，梳理了柬埔寨华文教育从初现、发展、受挫到复兴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了在此过程中柬埔寨政治体制变革、对外侨及华文学校的政策、中柬双边关系变化等外部因素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华文教育从初现到发展，既是区别于柬埔寨主流社会的“他者”，又深受其影响和制约；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华文教育处于消沉和断层状态，实为适应彼时的环境而“无奈”融入当地社会的结果；90 年代以来，两者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文化共享的关系，但是影响华文教育发展的一些非和谐因素依然存在。从整体上看，当代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正走向互惠共生的和谐发展模式，契合了建构“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柬埔寨；华文教育；中柬关系；融入；共生

#### 一 研究缘起

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与华人移居地文化接触互动的重要场域，也是华人社会延续的基础。柬埔寨 20 世纪下半叶政治体制的频繁变动，使其华文教育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点，展现了中华文化与当地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柬埔寨华侨志》是较早对柬埔寨华文教育进行描述和初步探讨的一本著作。书中设有专章“华侨文教”，介绍了金边和各省华校数量、聘任教师和招收学生的规定、华校的教学管理、私立学校纳税的规定等大致情况，为我们探讨二战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研究工作停顿了下来。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中国台北学者梁明著有《高棉华侨概况》一书，在第六章“华

侨之文化教育”中，简要介绍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柬埔寨华校的数量、设立条件、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情况，与上述《柬埔寨华侨志》的内容有许多重叠和交叉之处。江河在研究柬埔寨的华文教育时，着眼于 1958 年中柬两国正式建交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国经贸关系、柬埔寨战乱、华人社团、华人政策等外部因素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影响，提出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历程“马鞍形”的特点。邢和平和彭晖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柬埔寨华文教育经历的繁荣、衰退、再兴起的“马鞍形”变化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与研究，指出柬埔寨政府执行的民族和睦政策以及金边的报刊《华商日报》为华文教育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的来说，以上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皆探讨了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演变历程及华文教育复办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进入 21 世纪，学界从不同视角出发，考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现状。柬埔寨福建籍华人洪群从当地华校融入柬埔寨国家教育体系的可能性、必要性及相关改革措施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只有把华校融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使华文教育当地化，才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中国台湾学者林志忠考察了近百年来柬埔寨华校的发展情况，认为柬埔寨华校已由早期的华侨教育转变成华文教育，并且在柬埔寨全日制教育体制的影响下，未来有朝向中柬双语班发展的趋势。日本学者野泽知弘以各种势力与华文教育的关系为视角，分析了柬埔寨华文教育复兴与发展的原因，认为在柬埔寨华文教育事业中，除了华人社团的自助努力之外，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和国务院侨办的人力、物力支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对华文教育的支援中，以社团组织为媒介，华人与新华侨建立了共生关系。张悦从外部政策和内部体制两个方面，对柬华理事总会成立之后华文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从外部政策保障和内部体制改革两方面解决问题的对策。刘振平和贺丽君以华文教学为视角，从上课制度、教材和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试和评价模式等方面，探讨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的对策。罗杨运用“重写本”的理论框架，从“层累”的视角考察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危机”，论证了华文教育的内部结构在柬埔寨政治体制激烈调整下转折变迁、化危机为转机的历程，而新转化的华社结构也透过华文教育内容的调整进一步回应社区内外对族群身份的新需求。

综上，21 世纪以降有关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华文教育的复兴、发展趋势、危机、对策等问题展开，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积极且重要的基础。然而，其局限性也是显著的，比如较少直接聚焦于华文教育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移居柬埔寨的中国移民经历了从早期的移民社会向华侨社会，后又逐渐向华人社会演变的历程。柬埔寨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世代友好相处，共同开发，成为沟通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友好关系的桥梁。

当今，柬埔寨华人社会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其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华文教育融入当地社会并逐渐与之共生。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乃至人类普世价值观——“和谐”理念的落实落地，为柬埔寨华人参与构建和提升中国软实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研究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共生发展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及“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笔者自2016年开始持续关注柬埔寨华文教育，多次赴金边市、实居省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获得了当地华文教育的一手文献资料及口述史资料，由此建立起本文探讨此问题的基础和起点。

本文写作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美国学者马歇尔·萨赫林斯提出的文化进化理论。早在19世纪末，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进化的研究，就提出文化进化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然而此后的人类学家并没有对泰勒的这一观点给予关注，没有认识到进化过程的双重特征。1960年，萨赫林斯在莱斯利·怀特提出的一般进化论基础上，用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概念来观察文化模式中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既可以用适应的观点看，也可以从整体进化的观点来看。萨赫林斯指出，“文化如同生物一样，经历了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我们在特殊进化中所见之进步或改善与适应问题相关联；之所以是进步的，是指在一条线上由甲点到乙点、从少量到大量地适应某既定居所这样一个过程的意义而言。相比之下，一般进化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它是能量开发从小到大、综合水平从低到高、全面适应力从少到多的通道”。但是，特殊与一般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实，而是同一进程中的两个方面，即是同一进化事物中的两种情形。萨赫林斯清楚地阐明，进化在特殊范畴里是多元发展的，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新文化特点可以看作适应性进步，而在一般范畴里是线性发展的，可以将其看作“全面适应”的进步。线性发展与多元发展这两种各不相同但又不可分割、互为补充的进化关系，可以揭示出文化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

依据此理论，本文中，“一般进化”指的是柬埔寨华文教育在发展变迁中新阶段的产生过程，而新阶段的确立往往发生在互不相关的（或仅部分相关的）文化传统中；“特殊进化”指的是柬埔寨华文教育在进化诸阶段中的适应性变异过程。为此，本文从一般进化的角度，将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初现与发展、受挫、复兴三个阶段，找出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变迁趋势。这一趋势包括华文教育融入柬埔寨社会且逐渐与之共生的方式和特征，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对该趋势进行解释，是以文化一般进化中与柬埔寨华文教育相应的柬埔寨其他方面的发展为依据的。具体来说，每一阶段的华文教育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类型，对它们的解释需要参照特定的社会环境，包括柬埔寨政治体制变革、对外侨及华文学校的政策、中柬双边关系变化等。在此基础上，柬埔寨华文教育的特殊进化是一般进化中诸如适应、多样

化、专门化、衍生等方面的体现。日本学者野泽知弘曾指出，“一般说来，华文教育发展带来的华校的繁荣很大一部分受到该国的政治体制、对华关系和对华人政策这些敏感问题的影响。”就柬埔寨来看，当地华文教育正是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形成学者所谓的“马鞍形”发展历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变迁，在某些情况下，是与经济、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变化相对应的。而且，这种对应关系的背后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即华文教育与当地社会关系的融洽程度如何？如果仅以“马鞍形”这条发展曲线对其进行分析探讨，是不够的。因为柬埔寨华人对当地社会的感知，不是地理空间和社会环境本身的作用力的结果，而是他们在一定时空中因个体经历、亲人、生存机会、社会网络等归属感因素或变量而对当地社会产生的一种感知，并由此引致华文教育是否能够充分地融入当地社会，且逐渐与之共生。通过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会对柬埔寨华文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如华文教育在适应当地社会过程中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 二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初现与发展

柬埔寨华侨华人兴办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对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而言，华文教育是牢记传统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一传统因素在促使柬埔寨华人社会文化聚合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侨居环境中，华文教育从产生之日起便起着保护和传承族群文化传统的作用。

### （一）华人南来与华文教育的初现

据资料显示，柬埔寨华文教育发轫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1671年，明朝遗臣莫敬玖（又名“郑玖”）不服大清初政，率领亲眷、好友、随从等400余人，分乘战船十艘，从雷州港出发，渡海南下，抵达柬埔寨蛮衮地区。柬埔寨国王匿秋（即阇耶吉塔四世）对郑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蛮衮地区的地方长官——屋牙，以组织当地华人和百姓对该地进行开发。郑玖领导华人和当地的各族人民一起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开辟港口，兴建方城，很快把蛮衮建设成一个港口城市。郑玖在组织华侨垦殖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建学堂、办教育、倡诗文，以及招纳贤士等多种措施，传承中国文化并使之在当地传播。《柬埔寨华侨志》曾记载当时文化教育兴盛的场景：“郑天赐继任河仙总督，经历三数年承平局面，官制服装悉仿明制，招纳贤士，兴学设教”，同时“天赐为人风雅，更开设招英馆，供奉孔子及诸贤哲，广略汉文书籍，日与中国文武学者评解学理，研究韬略，并常与诗人朝夕唱和，吟咏河仙十景。汉学之风，一时大盛。”按《郑氏家谱》的说法，郑氏“博通经史、百家诸子之书”，并“建招英阁，以奉先贤，又厚币以招贤才，自清朝及诸海表俊秀之士，闻风



来会焉，东南文教肇兴自公始”。此外，越南史书亦有类似的记录，《嘉定通志》载：鄢天赐多方“招致文学才艺之士开招英阁，购书籍，日与诸儒论诗，有咏河仙十景，酬和者甚众，其文风始著于海陬矣”。这些史料是柬埔寨华侨华人兴办教育的较早记载。华侨能够顺利兴办教育，与当地统治阶级利用华侨劳动力对该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是分不开的。

19世纪，柬埔寨华侨华人接受文化教育的地点主要在他们建的神庙或者高棉族人的神庙中。例如，柬埔寨潮州会馆所属端华学校创办于1894年，从家乡潮州聘请了一名学者南来，把神庙侧室辟为教室，教授几个学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有时也根据实际生活需要教授珠算和书信等课程。此外，法国学者嘉克尼伯特和金霍迪曾以19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王昭君传说》在柬埔寨的译介为例，指出译者是一名祖籍福建的华人，在高棉神庙中受戒成为一名僧侣，接受文化教育。他在文稿序言中对父母和寺院住持表达了崇敬和感激之情，其诗中不但加入中国人与高棉族人之间的竞赛故事，而且对自然界的描写也是典型的柬埔寨式，这应该这是由于福建人后裔接受居住国文化的风格和韵律规则而形成的柬埔寨化。由此可见，早期华侨华人在高棉神庙中接受教育，成为他们融入柬埔寨社会的重要方式，并对他们的文学翻译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柬埔寨早期华文教育亦自私塾开始，这些私塾以金边最多。而新式华校的出现则始于1901年磅湛省三洲府潮侨所创办的学校。新式学校大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早期仍采用各帮家乡方言教学，且均是小学层次，比如金边的端华学校，其初期是潮侨先辈设立的私塾式学堂，以潮语授课，直到1914年才正式冠以“端华学校”之名。及后，福建帮公立民生学校、广府帮公立广肇惠学校次第创办；1931年，琼州帮公立集成学校、客家帮公立崇正学校亦相继成立。柬埔寨境内各地华文学校纷纷成立。据记载，1928年全柬华文学校发展到95所，学生达4000余人。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内文教界侨居中南半岛并受聘任者颇多，且逐渐提倡国语教授，侨民教育开始迈入正规化。1936—1937年，柬埔寨的华文学校有85所，教师有124人，学生有3339人。由此可见，早期地缘性华人社团的存在及其对兴办华校的支持，是促使新式学校出现的主要后盾力量，亦是中华文化能够顺利在柬埔寨稳定传播的一大因素。

在柬埔寨早期华人社会，华校往往与庙宇相邻，形成会馆、庙宇、华校三位一体的建筑格局。关于这种特色的形成，有学者认为这是入乡随俗的结果，因为柬埔寨古无学校，接受教育就在寺庙中进行。正如《真腊风土记》记载：“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其详莫能考也。”而华人长期侨居当地，深受高棉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故而会主动融入当地社会，自觉遵循其习俗。也有学者认为，初来柬埔寨的华人移民远在中华

帝国的皇权之外，也缺乏“士”这个文人阶层，其社会组织是依靠各自祖籍地的神明力量，所以围绕地域神庙进行办学，可以将自身的文化传统传给子孙后代，使华人社会的“香火”不至于湮没在异文化之中。

## （二）二战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

二战后，柬埔寨华文教育快速发展。尤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柬埔寨关系良好，柬埔寨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稳定，中国援助和投资的项目也较多，为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金边市端华学校、民生学校、广肇惠学校，马德望省国光学校，贡布省广育学校，磅湛省培育学校等，先后创办了初中。不久有金边私立华侨中学出现，无论师资、教材、设备各方面，都日趋完善。1956 年，柬埔寨华侨教育会统计：柬埔寨全境共有公、私立侨校 173 所，包括中学 7 所和小学 166 所，学生总人数共 28, 885 人。值得一提的是，1957 年，端华学校改为校委制，创造了规范的管理环境，获得柬埔寨华校“最高学府”的美誉。

1962 年起，端华学校、广肇惠学校、民生学校等均增办高中课程专修班，华文教育水平亦随之提升。当时除了新成立的 4 个边远省份之外，柬埔寨其他 15 个省市和各县乡镇都有华文学校，而且很多省、县有初级中学。资料显示，此时全国华校增至 200 所，中小學生增至 5 万人，其中以金边各华校的学生居多，如端华中学有学生 4500 人，广肇惠中学有学生 1200 人，民生中学有学生 1500 人，崇正小学有学生 600 人，集成小学有学生 450 人，等等。

田野调查发现，居住在各乡、村的华人接受华文教育的方式与城市又不太相同。以实居省森隆东县洛良格乡为例，他们主要在当地华人公司办的学校中学习，任课教师由公司董事长从中国聘请过来或者由当地老一辈华侨担任，教学语言是普通话或家乡方言。诚如一位潮汕籍华人回忆的：“这里先有华人公司（码头酒厂公司），后成立社团组织，再建立一所小规模华校。我的父亲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教师是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华侨，学习的课程以中文为主，也教授潮汕方言与文化，不单是华工的小孩可以上学，公司外的华人子弟亦可以在里面念书，但皆要交学费。”除了中文教育，每逢中国春节前夕，码头酒厂公司还会邀请潮剧演员过来表演，且伴有舞狮活动，让华人子弟在真情实景中感受和体验原乡文化的魅力。可见，这所学校主要招收华人子弟入校学习中文，接受原乡文化的熏陶，使得深厚的宗族、乡谊、亲情深深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于保存当地潮汕华人传统文化、凝聚潮汕华人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时期华文教育并非可以脱离柬埔寨社会而独立发展。作为弱势文化一方的华文教育，或多或少会受到当地社会各种势力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柬埔寨当局先后颁布了有关外侨归化的柬埔寨王国第NS904号法令、新国籍法、新移民法，以及多种对外侨在经济领域活动的限令，旨在引导当地华侨加入柬埔寨国籍，推动国内经济民族化。同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华校的左倾之风影响了柬埔寨本地学生，也促使柬埔寨政府对华校采取系列限制政策。譬如，1952年起，当局规定华校课程须增授柬文，柬语教员由教育部指派；最初规定每周六节，及后每周增至20节；而后又限制柬埔寨籍华人子女不得就读华校，学生须随身携带出生记录证明书，供随时检查，使得部分侨生不得不转入柬文学校就读。1956年6月，柬埔寨当局组成“尊重柬埔寨中立局势教科书研究委员会”，原则上将过去侨校之教材全部废弃，改用新加坡之联营版读本，以配合柬埔寨的中立政策。1958年4月，柬埔寨王国教育部下辖的督学官会召集华校校长座谈，指示各外侨学校应遵照王国政府教育部法令，学校教育切勿涉及政治，华校教科书应照指定采用新加坡版，其余一律禁止采用，于是正中版课本被迫停用。当月，柬埔寨王国教育部又通知各侨校，必须遵守规定，将学生学籍簿及点名簿办理妥当，并设置下列各项：将每级教室名称，用柬文或法文制成匾额，挂于该教室门首，以资识别；用纸板填写教室之华柬文教员姓名，及政府批准该教员执教之许可证号码；每个教室须标明政府所批准之学生名额；每个教室每日须填写学生到校人数及概况。上述规定，由地方督学官随时莅校检查。种种限制华侨及华校的政策的实施，推动当地的侨民教育逐步转化为华文教育，使其逐渐落地生根于柬埔寨社会之中。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柬埔寨华文教育遇到了诸多难题，但这并非皆由外部政策因素引起，应该注意到，华文教育自身实力的薄弱、组织结构的不完善和华文教员的缺乏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首先，公立华校多数缺乏资金，经费来源大部分依靠学费收入，不敷之数，多依赖侨商捐助，或者开游艺会筹款弥补。其次，每间学校均有董事会组织，凡是教职员的聘任，须取得董事会同意，而董事会常常改组，教职员因此连带更替，使得教育者无法安于其位，时怀得过且过之念，这是华校不能充分改进与发展的原因。再次，师资缺乏，50年代末教员不足700人，且常有因年老退休或转营商业的教员，物色替人也很困难，小学教员大多可以聘请初中毕业生担任，中学师资唯有向中国方面求助。但由于入境限制，大量补充师资是不可能的，于是只有向其他学校现任教师中争聘，或者降低聘任要求，或者增加现任教师的任课时数，自然严重影响了教学效率。但是，这个时期的柬埔寨华文教育还是获得了发展。这主要是因为1958年7月19日中国与柬埔寨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以后至60年代末期，中柬关系发展良好，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来往密切，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

克亲王 6 次访华（1956 年、1958 年、1960 年、1963 年、1964 年、1965 年）、中国周恩来总理两次访柬（1956 年、1966 年）、陈毅副总理 3 次访柬（1958 年、1960 年、1964 年），等等。在此期间内，中国是柬埔寨最主要的援助国之一，对柬无偿援助累计达 2.15 亿人民币，其中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援助。1956 年，中柬两国签订了第一个经济援助协定以及实施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国向柬埔寨提供 8 亿瑞尔的无偿援助。1964 年和 1965 年两国两次签订了援柬军事物资和装备议定书，1965 年两国又签署了文化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此外，中国还派出大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柬埔寨援助建设。

整体而言，在这一阶段，华文教育融入柬埔寨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充分的。就其深度而言，此时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地域认同是较为单一的，对地域的感知往往来自家族、宗族、朋友、地域网络、历史记忆，即是一种心理与地理空间上的认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华校的兴办与建设尚未完全脱离祖籍地的社会文化网络，往往以地域为边界，在地缘性华人社团的自助努力下成立相应的华校，有的华校在教学语言上甚至沿用家乡方言。就其广度而言，华校招收与培养的学生主要以华人子弟为主，若想招收柬埔寨本地学生，还需得到当地政府允许。正如潮州帮公立端华学校李辉明校长曾指出：“早年移民的先辈们，奉公守法，胼手胝足，勤劳刻苦，努力创业。当生活安定之后，就设法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先辈们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却始终不忘故里乡情，也希望子孙后代能继承祖辈的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不忘民族的根源。凡在华人居住比较聚集的地方，都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华文学校，以不同的教育方式，让华胞子女接受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由此可见，铭根念祖，牢记传统，使得早期移居柬埔寨的华人自觉兴办与建设华校，努力发展华文教育，重视中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即便“民族情结是华文教育的坚固基石”，但此时华文教育的发展并未与当地社会发生矛盾冲突。相反，为了在与异族社会保持平衡状态之下求得生存与发展，各大华校自觉地遵守柬埔寨当局对华校实施的各种政策、法令或要求。同时，尽管这些政策、法令或要求是限制性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总体上是较为平和的，寓引导于管制之中，对华校的冲击不大，只要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华校一般都能正常运营。

### 三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受挫与断层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朗诺政权上台后，建立了亲美的傀儡政府，并废除君主政体，宣布建立共和政体。朗诺政府对华人有诸多限制，不准华人兴办学校和高等学府，也不准华人在学校用华语交流，强迫华人学习柬语。同时，当局还发现少数华校有左倾学生被诱参加越共游击队，于是下令将境内 173 所华校全部关闭，并予以接管，将校舍移作兵营或难民收容所。从那以后，柬埔寨的华文教育受到严重影响，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时期和断层阶段。

田野调查发现，此种结果对城市和各乡、村的华文教育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在城市的华人无法再接受正规的华校教育，转而进入家庭式教育这一非正规渠道，但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而在各乡、村中，以实居省洛良格乡为例，当地华人跑到华人办的公司里避难，但仍躲不开美军飞机在附近陆续的轰炸，再加上朗诺军人对华人企业的层层施压，如征收特别税务、强迫他们向政府捐款等等，使之生存愈发艰难，无力保护和帮助公司里的华工以及维持文化教育的继续运营。最终，许多人被迫离开公司和校舍，逃至偏僻的农村落脚，有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死于饥荒、疾病和迫害。

在东北、西南民主柬埔寨管辖区，情况则有所不同，1970年至1973年，华文教育出现了大发展。冒着飞机轰炸，华文学校坚持上课，大批知识青年踊跃加入教师行列，连一些原来没有华文学校的小乡镇也办起了华文学校。但是，从1974年起，民主柬埔寨管辖区的华文教育先后被全面禁止，甚至华侨华人在公开场合讲母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除极个别地方以外，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华文教育基本是一片空白。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文献和口述资料中略知一二：“在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的民柬执政时期，柬埔寨的华人、华侨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人数从60年代末期的50万人减少到30万人，更不要谈华文教育了。那时，除了极个别的父母向子女私下传授华文外，华人、华侨被禁止在公共场所用华语进行交谈。”“在这一时期，华语一律禁讲，街上所有华语广告牌、路标、各类中文补习班、中文授课学校一律被取缔。书摊上不准出售中文书。甚至连华人自己也不敢讲华语，以免暴露身份而遭至非人迫害。”“波尔布特掌权时期，我们一家人被赶到了马德望省，在那边集体生活时，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敢说华语，更别说向孩子们传授中华文化了。还有，我们一家人对外一致承认自己是柬埔寨人，要不然会因为华人身份而惨遭迫害。”“在茶胶省集体生活的那段日子，我很少说话，因为我说的的高棉语带有家乡方言的口音。如果使用华语与其他华人交流，必然会惹来各种麻烦，所以日常交流我一般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我的大哥会说一些潮州话，是一位知识渊博、思想活跃的人。在波尔布特掌权时期，他可能在集中营中说了几句潮州话并被人发现了，于是被叫到一个地方给军人看病，这其实是杀害我大哥的借口。”

从以上的文献和口述资料得知，在民柬执政期间，柬埔寨境内不仅没有华文学校，华侨华人甚至不能或不敢公开使用华语交流，华语成了受孤立和敌视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柬埔寨华人在家庭和社会语言使用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开始将高棉语作为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华族身份，以求得自身安全。笔者在实居省洛良格乡调研时，发现当地华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大同小异，亦即认为，这是由于多年战乱和当局实施关于禁止讲华语的措施而导致的。因此，此种现象是柬埔寨华人适应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

环境的产物。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曾指出：“变迁常常是由意外事件导致的，包括当前事件的非预期后果，另一个原因是人们为了解决一些感觉到的问题而进行刻意尝试。”依此观点来看，波尔布特集团在制定政策时，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侨华人普遍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当中，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族人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压力。对此，柬埔寨华人及时调整语言适应策略，促使日常用语发生变化，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影响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进行的一种无奈尝试。

1978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扶持以韩桑林为首的金边政权。被红色高棉强制遣送到农村的华侨华人，部分陆续返回城市或各乡、村，也有部分通过陆路或海路逃往海外生活。回到城市的华人对于刚刚过去的噩梦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他们的子女大多数被送入柬埔寨人办的学校学习柬文。而那些回到各乡、村的华人依然为生存问题而挣扎。根据访谈资料得知，他们的房子或被烧毁，或被他人占用，加上周边局部战火不断，故而不得不暂时借住在寺庙、柬文学校或者投靠远方亲戚。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至1986年间，苏联支持金边政权并对其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同时允许当局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影响下，柬埔寨当局要求民众学习俄语，禁止学习华文，否则会遭到政府的严厉制裁，甚至被逮捕。由此可见，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柬埔寨华文教育由盛转衰，被移居地文化裹挟并逐渐消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华人自身的生存机会看，当时柬埔寨华人既要适应诸如衣食住行等物质生存环境，也要适应柬埔寨当局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故而集体有意识地融入柬埔寨社会当中。

与上一个阶段相比较，此时的华文教育事业横遭摧残，华文学校惨遭浩劫，校舍毁坏，教员遣逃，学生离散，一片疮痍。在生死存亡抉择问题上，柬埔寨华人不得不隐藏或者放弃原有的身份，自觉融入当地社会，努力维持与异族社会关系的平衡。然而，这种融入方式带有一种强迫性质，并未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从华人本身的态度看，即使华人自认为是中国的宗族成员，但是在面对柬埔寨当局实施的限制华人语言文化发展的政策且无法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使用高棉语进行沟通与交流。从当局对华人的态度看，朗诺政权时期，大批华人被当作西哈努克和越共的支持者而受迫害，华人被剥夺了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这是比封闭华文报刊受害更深的打击。民柬执政时期，当局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发布取缔私营商业和废除货币流通的命令，不允许华人拥有私有财产，没收城市全部工商业，将华人以“疏散”的名义迁往边远乡下，甚至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顷刻之间，阶层分化不复存在，华文教育彻底中断。在197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亲越南的金边当局追随越南的反华排华政策，歧视华人。当时政府颁布了针对华人的“351通知”，对华人进行政治甄别。

不要说一般华人遭殃，就连有华人血统的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也被牵连，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直到 1985 年，该文件才被取消，华人和华文的地位开始得到肯定。

#### 四 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复兴与困境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家庭华文补习班陆续产生，虽然华人子弟仍旧无法受到正规华校的系统文化教育，但通过这些补习班可以重新拾起华语知识，勾起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当时大多数的华人家庭教师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冒着一定的风险，在陋巷里、小阁楼上办起家庭式华文补习班，把教授华文华语作为谋生手段的同时，亦为柬埔寨华文教育填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空白，为后来华文学校的复办创造了条件。

随着柬埔寨内战的停止，民族和解，政府推行经济开放、文化多元政策，在此氛围之中，华文教育也重获新生，得到迅猛发展，呈现勃勃生机，大量华校得到恢复和重建。1990 年 8 月 3 日，柬埔寨政府发布《第 248 号法令》，规定：(1) 允许成立柬埔寨华人理事会；(2) 允许设立华校及恢复华人庙宇和华人传统的庆祝活动。同年 12 月 26 日，在当时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谢辛的积极推动下，“柬华理事会”成立了。以柬文、中文书写的“柬华理事会成立典礼”大幅横额高高挂起，预示着在柬埔寨公开使用华文是合法的。1991 年 10 月，在热心华文教育事业的陈薯先生的奔波下，“磅湛省棉末县华侨公立启华学校”首先复课。在金边市，家庭式华文补习班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91 年 12 月起至 1992 年 8 月，独资或合资开办的中央学校、坡隆边学校、立坡学校、莎丽娜学校、华群学校、培文学校相继开学。金边市以外，马德望省马德望市联华公校、贡布省逢咋叻市觉群学校、桔井省桔井市中山学校先后复课。至 1992 年 9 月，全柬向政府教育局申请新办和申请复课的华校共 12 所，学生 8600 余人，教师 127 人。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柬埔寨各大华校的顺利复课离不开华人社团和其他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因为按照柬埔寨当时的做法，倘若学校的校舍被当地居民占住和使用，即便承认校舍产权归于原先的华校，也必须给当地居民另找其他住所，校舍才能让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端华、民生等华校由相应的社团牵头，向柬埔寨境内外的华侨华人募捐了一笔巨额资金，最终才“赎回”校舍。一篇记述柬埔寨华文教育复兴过程的文章这样写道：“1992 年 5 月，柬华理事会蔡迪华、杜瑞通、林国安、郑荣吉等理事邀请了王继虞、洪睦民、杨豪、唐振明、李辉明、柯美玲、梁淑明、蔡伟元、周冰秀、蔡志强、蔡忠枝、李冠雄、赖文茂等 10 多位柬埔寨战前华文教师举行座谈会，成立‘金边华校复课委员会’。另一方面，柬华理事会呼吁热心华商捐款资助华文教育事业，获得了热烈响应。赖振义先生为赎回端华中学校舍，捐款 40,000 美元。在赖振义先生带头下，其他热心人士也纷纷捐款，端华中学大楼大部分居民得到补贴迁出去了。1992 年，端

华学校复课，近 2000 名学生高高兴兴地走进曾经是柬埔寨最有名的华文学府。复课之初，热心人士方侨生先生还向母校教师福利会捐款 10,000 美元，对当时在校教师给予了及时的物质帮助和精神上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地方华校的复课，与柬华理事总会在各省、县市相继成立地方分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2003 年 12 月，柬华理事总会在 15 个省、3 个特别市、65 个县市成立了分会。在省、县市成立柬华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设华校，即通过设立柬埔寨理事会团结当地的华人组织，解决筹资、与当地政府交涉等有关华校建设的种种问题。

从整体上看，当代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表现为更为紧密的共生关系，双方互相接纳和融合，形成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格局。

首先，目前柬埔寨的华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华校由柬华理事总会统筹，由华校所归属的地方理事会管理和经营，各理事会会长即为学校董事会负责人。私立华校主要是指个人建立的语言学校，比如金边的立群学校。这些公立、私立华校还开办了“夜校”，实行五日工作制，招收社会人士学习华文。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华校，都多数实行半日制华文教学，这是柬埔寨华校不同于其他国家华校的主要特点之一。有学者曾对金边、外省市的 15 所华校进行调查，发现 80% 的华校都实行半日制教学模式，全日制教学的占 20%。所调查的 15 所华校都设有 2 个教学部，即华文部与柬文部。两个部门的班级数比例约为 3.5:1，师生人数比例在 4:1—7:1 之间。可见，华校的重心虽然在华文教育，但也将柬文教育容纳其中。这些半日制华校实行的是六日工作制，每天 8 节课(夜校除外)；全日制学校实行五天半工作制，每天 5 节课(夜校除外)。

关于实行半日制教学模式，金边各大华校的负责人皆认为，这是因为柬文学校缺乏资金建教学楼，没有足够的教室上课，所以许多学生分别到华校和柬校各学习半天。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会馆下设的民生学校已经办有全日制班级，从幼儿园至小学四年级各一个班，学生上午到学校学习，中午在学校吃饭和休息，直到下午下课后再离开学校。对此，该校 LLD 校长告诉笔者：“这是前任校长的一个举措。他认为，如果柬埔寨政府要办全日制柬文学校，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生源了，所以要抢先办全日制班级，以保障生源。”但笔者认为，由于柬埔寨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当局现对华文教育实施宽松政策，当地民众对学习华文充满热忱，因此这两种教学模式仍会共生下去，且仍以半日制教学模式为主，这也是华族与高棉民族之间互惠共生与和谐发展的共同需要。

其次，由于柬埔寨王国政府对华人和华文采取开放宽松的政策，近年来华人文化蓬勃发展，华文的使用深入社会各层面，加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企业到柬投资的增加，为华教的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譬如，金边最大的华文书店——国际书局，从新加坡、中国内地（大陆）及港台地区进口各种华文图书，推动柬埔寨华文的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语电视连续剧常常被翻译成柬文，在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华语歌曲亦深受柬埔寨当地人的喜爱，成为电台或娱乐场所的必备节目，演唱者或者将歌词翻译成柬文，或者直接用华语演唱。此外，金边华文书写的商号招牌比比皆是。尽管当局规定，凡是外文招牌，柬文要写在上面，外文写在下面，外文字体要比柬文小 1/2，以维护柬埔寨文字的尊严，但实际上，往往是华文和其他文字的位置和个头都比柬文来得大，有的干脆只有华文。此种现象表明，华人在柬埔寨使用越来越普遍，并由此引致大多数华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华文教育是柬华理事总会最大的投入。据柬华理事总会秘书处统计，截至 2022 年，全柬共有公立华校 57 所，学 39, 240 人，教师 1253 人。其中，端华学校有学生 14, 435 人，教师 283 人；崇正学校有学生 3557 人，教师 105 人；民生学校有学生 1469 人，教师 65 人；广肇学校有学生 2273 人，教师 110 人。但也有例外情况，如海南同乡会办的集成学校。尽管该校于 2008 年搬迁至占地约 1500 平方米的新校址（即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援建的体育城），办学条件较之过去有所改善，但是学生人数却从 20 世纪末鼎盛时期的 1700 多人降至目前的 85 人，教师也相应减少至 9 人。据称，这是因为受到学校乔迁和教学设备落后的影响，加上学校缺乏有力的资金资助，没有购置校车接送学生，导致学生大量流失到其他华校。

与此同时，各大华校基本涵盖了主要的培养层次，即幼儿园（三年）、小学（一至六年级）和初中（一至三年级），开设的课程有常识、地理、历史、数学、英语、道德，除英语外，均以华语教学，这是当今柬埔寨华文教育与东南亚其他大多数国家华文学校的不同之处。同时，各华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皆开设了柬文课程。有的华校为了与政府要求接轨，还开设了正规的柬文班，由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派来柬文教师，社团发放工资，并且使用规定的柬文课本，以便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高考。

再次，各大华校坚持开放包容的办学理念，积极吸纳友族子弟入校学习，在支持当地教育事业的同时，也增进友族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充分体现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特质。每所华文学校的学生已不全是华人后代，还有非华裔的柬埔寨学生和僧侣。实际上，华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就读于柬文学校的学生，接受国家的国民普及教育。华人子女在接受国民普及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中华传统华文教育和英文教育，说明华文教育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媒介，也是促进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媒介。譬如，目前民生学校和集成学校的学生构成是华裔学生和非华裔学生各占一半，而且非华裔学生数量还有增加的趋势；崇正学校的非华裔学生占比 20%；端华学校开办的夜

学班也招收了超过一半的非华裔学生。据这些校长解释，之所以有这么多柬埔寨家长送孩子到华校学习，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投资的企业将掌握华文作为招聘的首要条件，若能掌握华文，便可以找到一份薪酬更高的工作。从笔者在柬埔寨的多次调研来看，实际上，柬埔寨华人在当地国定位自己时，与高棉民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彼此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人”，都是组成柬埔寨大家庭的族群之一，认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经历了相同的苦难，且有着相同的民族国家意识。不过，柬埔寨华人在定位自己时，族群认同依然是显著的，称自己为“土生华人”。这一点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类似之处，有学者认为这是华人的“多重认同”或“叠合性认同”现象。

最后，在历史积累的作用下，华裔学生对华文教育的认识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转变。一方面，虽然华裔学生学习华文的目的、兴趣、需求和态度各不相同，但大多都有这样的倾向：学习华文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内在化”于他们的心灵，而掌握华文则成为谋生计的必要语言工具。也就是说，华裔学生从小成长于华人家庭，与祖辈或父辈一起参加带有中华文化烙印的各项文化活动，在这一文化环境的耳濡目染之下，明白了这些文化传统的意思，并且认为它们是真实的、正确的，于是中华文化被作为个人信仰而获得，被用来构成他们的感情世界，最终“挑起”他们学习华文的意愿。但这并不构成他们学习华文的真正动机。在华裔学生看来，学习华文是一种有报偿性的行为活动，尽管他们自身扮演的角色是文化传承规定的，但学习华文是被满足个性需要的预期所激励的，而这种需要就是他们异口同声所谓的“谋生计”。由此可见，华裔学生更为看重学习华文的结果，即掌握华文这一谋生工具。另一方面，与老一辈华人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华裔学生的地域认同已逐渐式微，他们试图打破地域边界，和其他华人方言社群及柬埔寨学生交流和融合。例如，客家人办的崇正学校就容纳了潮汕籍、福建籍、广肇惠籍、海南籍甚至华人新移民的子弟。一位潮州籍华裔学生说道：“按理说，我应该去潮州会馆办的端华学校读书，但那边学生人数太多了，一个班级不少于50人，无法保证优质的教学质量，因此我选择到崇正学校学习，这样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学习与沟通。”简短的一句话，实际上反映了柬埔寨华人融入和适应当地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结果。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柬埔寨华文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非和谐因素。一是柬华理事总会与各大公立华校之间以及各大公立华校之间的矛盾关系依然存在。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柬华理事总会与金边和各省份的社团及其所属华校，分别形成了会馆的多元化管理与“总会一分会”一元化垂直管理两种关系模式；柬华理事总会希望对下属会馆、分会及其学校实行垂直的一元化管理，在华文教育方面提出“统一教材、统一课纲、统一考纲”的要求。以民生学校的教材为例，该校于2008年停止使用柬华理事总会编写的教材，

认为这些教材内容已过时且不连贯，并与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对接，采用了暨南大学编写的从幼儿园到中学的系统性教材。然而近几年，在柬华理事总会的交涉下，暨南大学中断了教材的赠送，学校只能采取复印教材的办法进行教学。

同时，这种矛盾关系还表现在各大华校之间的生源和声望竞争上。笔者发现，无论是华校的校长还是教师，在接受访谈时，总会比较各所华校的学生人数，并且表达自己对生源问题的焦虑。由此可见，对于传统华校来说，经营中“市场竞争力和招生问题”远比“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传承培养”更需要获得关注，即唯有强化市场竞争力，增加生源与收入，华校方可持续发展。此外，在许多柬埔寨华人看来，所谓“市场竞争力与招生问题”与华校自身的声望密不可分。例如，谈及集成学校的发展问题时，有华人这样说道：“现在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很重要的原因是集成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地位不高，没有出现响亮人物，所以没有多大财力回报学校，再发展学校。”关于以上两重矛盾关系的存在，实际上可追溯到近代法国殖民者按照地缘社群的划分进行分而治之，致使华校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各个地缘社群手中，而且地方观念强烈，逐渐淡化了合作意识。

二是本土华文教师队伍普遍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象，鲜有本土培养的年轻华裔教师投身于华文教育事业。许多中青年教师借着熟练的华语工具，毅然放弃华文教职，选择到薪酬更高的华商企业工作，寻求改变贫穷家境之路。为此，端华学校校长感叹道：“我们学校 200 多位老师中，像我这样年龄的人(60 岁左右)占了 100 多位。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愿意来接我们的班，觉得工资低了，更愿意到公司发展。虽然我们也在努力提高工资，但是涉及学费的问题，需要保持收支平衡，所以我们学校本地的年轻教师只有 6—7 位。这亦是整个金边华文教育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据笔者的访谈发现，过去战争内乱带来的伤害已经在这些中青年教师心中埋下了阴影，在当地人面前，他们大多已经不那么强调华人身份与角色定位，而是以平等友善的方式不自觉地、集体无意识地融入柬埔寨社会。

三是乡级以下的地区尚未拥有普及华文教育的条件，许多华人后裔和高棉族人几乎没有机会学习华文。诚如实居省狮子桥村副村长所言：“村里有 40 多户华人家庭，许多华人子弟都想学习华文，可是附近没有华校和华文教师，却有一所免费提供英文教育的基督教堂。不过，农村的华人都忙于生计，也没有多少经济能力送小孩到县城或金边学习华文，所以有很多华人子弟在柬文学校读完初中就出来找工作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村存在这种现象。”对此，笔者在该村开展了一次有关家庭、学校和社会语言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一共发出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结果显示，这 100 位华人皆不会说华语，均使用高棉语交流。当地华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始于朗诺政权时期，发展于红色高棉和金边政权时期，

此后也不会结束。由此可见，“一些重要事件或意外事件往往会导致文化发生变迁，其后果是不可预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华人在无力抗衡当局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改变语言交流方式，以适应生存环境。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这种“有意识地说高棉语”的命题如何转变为“无意识地说高棉语”的命题呢？用美国人类学家斯皮罗的观点来看，这是传统的作用。具体来说，这是柬埔寨华人群体在历史经历中形成的一种社会遗产，是他们通过适应当地国语言文化获得的集体而非个人的符号。

## 五 结 语

本文从历时角度出发，梳理分析了柬埔寨华文教育从初现到发展、受挫再到复兴的历史变迁过程，亦讨论了柬埔寨政治体制变革、对外侨及华文学校的政策、中柬双边关系变化等外部因素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影响。在法国殖民时期，由于对华侨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即与其他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侨一样，柬埔寨华侨必须按照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福建帮、海南帮等分区居住，由殖民当局认可的各帮帮长担任各帮区的行政首领，所以这一时期的华文学校亦“分帮而设”，使用各自方言教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柬关系发展良好，两国1958年7月19日正式建交，加之柬埔寨国内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其对华侨的政策也较为平和，柬埔寨华文教育得到快速发展。1970年开始，柬埔寨陷入长期的战乱，华侨华人成为柬埔寨政治冲突的牺牲品，经过朗诺和红色高棉两个时期的压制和摧残，华文教育命运每况愈下，濒临灭绝的境地。1979年后的一段时间，金边当局效法越南，歧视当地华侨华人，华文教育也因此受到牵连。1991年以来，柬埔寨政府取消了所有对华侨华人的法规性歧视和限制，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华人基本上享有与柬埔寨土著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国内外华人的经济力量，重振因长期战乱而残破的社会经济。尤其是为了吸引中国内地（大陆）及港台地区的资本，柬埔寨政府开始重视华人的地位和华语的实用价值。在此氛围之中，华文教育重获新生，积极走向复兴，成就令人瞩目。当今，随着中国与柬埔寨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两国正在构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柬埔寨华文教育因此也势必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

分析这些外部因素对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影响，有助于聚焦文章讨论的问题，即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发展演变。经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查阅，文章认为，华文教育融入柬埔寨社会是一个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渐变过程，且经过不断的磨合与融合，形成了较为和谐的互惠共生关系。这一发展趋势，适应了柬埔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共生的需求，诚如端华学校前任校长李辉明所言：“华校是为国家培育多元文化人才的基地”，“华校能培养出一批批高素质的、品行道德良好的年轻一代融入柬埔寨主流社会，这对柬埔寨的文明、进步

和国家的建设等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就柬埔寨华文学校而言，从它早期的办学开始，就明显受到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使其在语言教学、课程设置、教材、升学考试等方面不得不遵循柬埔寨政府的相关要求。文章认为，早期华文学校融入柬埔寨社会是有意识的，也是自觉的。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华人因族群身份的异类以及作为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能够活下来已属幸运。在此时代背景下，华文学校被当局剥夺了所有，华人子弟因而失去了求学的机会，甚至不敢公开讲华语、写华文。自 90 年代以来，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柬埔寨华人来说，一场大劫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侨”字也不复存在，所有华人都成为组成柬埔寨大家庭的族群之一，即华族。当今，接受华文教育对他们来说既是必要的，但又不那么强调。他们逐步淡化了单一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观念，反而更为强调与柬埔寨主流社会的相互协作和文化共享。正因为如此，柬埔寨华文学校逐步改变了以往各自为营的办学模式，试图打破地域边界和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积极吸纳其他华人方言社群和友族子弟入校学习，构建起以华校为节点且不受方言或地域限制的文化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柬埔寨华文学校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开始主动且无意识地融入当地社会之中。这种无意识的融入是自然而然的，无须刻意追求，就如感情一样，是个人的，发自内心的。这主要是因为移居经历、生存机会、社会网络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使得柬埔寨华人对当地国产生了亲近感和归属感。当地国的文化传统、习惯、规范已为他们所内化，并激励着他们参与柬埔寨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为巩固中柬两国的传统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在适应当地国环境过程中，华文教育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演变。在结构方面，当代柬埔寨华文教育虽留有法国殖民时代的地域分化特征，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必须接受柬华理事总会的统一领导与管理。柬华理事总会为对各所华校的控制，实施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措施，诸如采用总会设置的课程和考试大纲、使用总会印发的教材、放弃原有的方言教学等。然而，由于柬埔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加快，这些约束措施反而逐渐进一步满足了华文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包括各所华校希冀得到总会在资金赞助、外来援助师资分配、中文写作比赛获奖名额等方面的支持。换言之，这些约束措施由“外在的控制”转变为“内在的控制”，即为华文学校所内在化，倘若不遵守这些规范，就会导致所谓的“焦虑”。由于这种焦虑能够通过遵守这些规范而减少，所以当今柬埔寨各所华校正在不自觉地接受这样的一种管理体制，即便它很容易演变为社团政治和地缘竞争。除了接受柬华理事总会的领导与管理外，当代华文教育正逐渐与柬埔寨本土教育接轨，不少华校已开设正规的柬文班，采用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编写的柬文教材，并主动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聘请柬文教师，由华校

所属的社团负责发放工资。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1月9日，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与中国教育部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预示着华文教育即将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在功能方面，当代华文教育不仅具有“文化性”，即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同时也具有“实用性”和“世界性”，且后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方面，华文教育已不仅仅是秉承传统的问题，更多是为柬埔寨华人增添一门新技能、新工具，帮助他们在当地社会更好地实现个人职业理想。另一方面，华文教育已不专属于柬埔寨华人群体，当地土著子弟亦可进入华校学习，华文与英文、现代信息技术一道，逐渐成为当今柬埔寨青年追求新知的三个重要目标。譬如，由柬华理事总会创办的柬华理工大学，面向全体柬埔寨学生招生，以中文、柬文、英文为授课语言，主要设置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的专业课程，旨在响应柬埔寨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以及柬埔寨王国政府鼓励发展科学、技术创新和提高柬埔寨教育质量的愿景。2022年6月23日，该大学决定与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开发公司之一、拥有5G、云计算、智慧校园和智能教育技术的华为柬埔寨公司携手合作，加强在技术开发、研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交流，以期推动柬埔寨科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让柬埔寨的教育向世界水平迈进。关于兴办柬华理工大学，有学者指出，“柬华理工大学从构想到建设似乎都有一种脱离传统华人社会，面向更广阔的柬埔寨社会乃至国际化的倾向。”实际上，这是柬埔寨华人及华文教育在无意识和不自觉中融入当地社会的真实反映，并且有着一种往“在地化”发展的倾向。在田野调查期间，金边各大华校的校长还告知笔者，现在柬埔寨的华人子女以第三、第四代居多，大多数已不懂华文，原来的母语——华语已退居为第二语言，语言环境的变化也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一大困难。

总的来说，认识华文教育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发展演变，探求当代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非和谐因素的解决路径，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柬埔寨各民族的民心相通，亦有助于建构“中柬命运共同体”。（**本文来源：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

## ◎热点分析

### 如何从东盟的角度看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 IPP “东南亚的和平与未来” 学术研讨会发表线上演讲，题为“东南亚与中国的周边外交”。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表示，东南亚地区局势深受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动态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走向也受到美国等域外因素的牵引。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当前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正面临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对华负面叙事、贸易战等多层面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盟将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有价值的外交领域。”

“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保障地缘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东盟。”

今天我想从更广的范围来探讨一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大环境和中国的周边外交，包括中日韩、东北亚、东南亚、俄罗斯、中东、南亚等等。毕竟，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已经很难把某一区域的外交和另外一区域的外交分开。

我记得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东方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中国“睡着”了以后，整个近代历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被打败，后来又被“曾经的学生”日本打败，经过从 1840 年到 1949 年一百多年的战争与革命，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醒来之后的崛起。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之一了。下个问题就需要考虑：我们“睡着”了之后被人家欺负；我们醒来崛起了以后，人家对我们怎么围堵、遏制甚至扼杀？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东盟关系尤其重要。

现在的中国—东盟关系受到大的国际环境的强烈影响。对此，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微观层面，各国内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主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不可分的，就像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现在的世界，各国的内政是怎么样的？就像这一次欧盟议会选举所表现的那样，无论是美国、欧洲甚至拉丁美洲，无论是西方、东方还是北方、南方，不分发达与不发达，不分政

治体制如何，全世界都面临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崛起的局面。

这种局面尽管是内政层面的，但是国际关系学者绝对不能忘记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过的教训。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体两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会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长期影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涉及到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局的消解和稳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一战、二战以前的民粹主义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往前可以看到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大家要留意，这里所说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右派的主张，左派的主张也表现为民粹主义。各国左右派极端主义的冲突，很容易表现在国际政治上。

第二，中观层面。在国家层面上，民粹主义势力已经开始角逐政权。从这次欧盟议会选举来看，极端主义和极右派的上台是大势所趋。如果特朗普再一次上台，那么美国组成一个“准法西斯主义政权”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之前演讲时就提到，要把他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都“lock up”（抓起来）。这些说法都是民粹和法西斯主义情绪的释放。

对中国而言，如果像蓬佩奥、博明那些极端仇视中国、仇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上台，美国很可能对华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会影响到欧洲政局，使欧洲出现更多“准法西斯主义”政权，就像二战前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多国上台一样。

当然如果拜登能够继续当政，对极端派会有一些的抑制作用，但我们也要清楚看到，他的对华政策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基辛格先生讲过：“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战争最后发生了”。大家都想用其他方式解决国内的和国际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最后诉之于暴力。国际的战争和国内的暴力，逻辑是一样的：

国内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就诉之于暴力；国际社会上，弱小国家反抗大会诉之于暴力，大国如果解决不了小国问题或者解决不了与其它大国的问题，也会诉诸于暴力。

第三，宏观层面，地缘政治的两极化已经形成一个大的趋势。两极化既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政治层面和国际地缘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拜登所说中美竞争就是“美国民主VS中国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层面，以世贸（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已经失灵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下各种“团团伙伙”的贸易协定。我们一直说美国是“去全球化”，但实际上美国是在重新塑造以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组织。最近这段时间，西方也在开展另外一种话语，即所谓“中国的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塑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全



球贸易体系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呢？虽然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脱钩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要小心。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花了很大精力重塑地缘政治，在中国周边建立了多个“团团伙伙”的排他性联盟，这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形成的一种体现。

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力量互相强化，正在加剧世界秩序的重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深刻意义。从最近的趋势来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较之美国而言有比较大的改善，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同样影响着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尤其是这一次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论坛对话，和往年相比有很多新的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美国和欧洲都在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和亚太地区，这些年美国调整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框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意外的是，欧洲的地缘政治重心也转移到了印太和亚太地区。香格里拉对话本来是亚太安全的对话，现在已几乎变成了跨大西洋的安全关切。从前段时间拜登接受媒体采访可以看出来，美国方面对俄乌战争的进程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包括每天用了多少炮弹、牺牲多少士兵。为什么俄罗斯现在没有像西方所认为的“很快就会失败”？现在美国和欧洲一直在打认知战，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尽管这种“绑架”从俄乌冲突一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西方开始将打不垮俄罗斯的原因归因于中国。美国的高级官员一直在塑造“正是因为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的产品，俄乌战争才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话语。尽管美国、欧洲自己也在和俄罗斯进行能源等方面的交易，但是中国被视为是俄罗斯打消耗战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我们不能小看这种认知战。欧洲无论是媒体还是外交界、战略界，现在正在把所有抱怨和仇恨发泄到中国身上，认为中国现在是俄罗斯能打持久战的根源。这不仅影响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更影响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东盟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最有价值的外交领域。我们看看东北亚。日本、韩国已经是完全“躺平”了，因为他们的安全体系就是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决定在外交上继续跟随美国。我们和俄罗斯关系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两个国家有各自的战略考量，我们一定要注意俄乌冲突的局势，关注俄罗斯各方面的决策动向。如果俄罗斯自己调整了，中国还没来得及调整，那么我们将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我注意到，在西方纪念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普京也召开了几个小时的会议。从字里行间的表述来看，实际上普京是希望调整这场战争的。不管怎么样，俄罗斯还是西方的一部分——从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唯一的目标就是变成“西方国家”。事实上，俄罗斯和

西方的关系和我们所认知的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没有那么对立。当西方排斥俄罗斯时，俄罗斯反西方；当西方接受它的时候，俄罗斯高兴还来不及。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到俄罗斯的叶利钦，再到早期的普京总统，都是非常亲西方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围绕这次俄乌战争，俄罗斯对西方态度的调整。尤其是美国把中国看成唯一的竞争者以后，美国会重新考量俄罗斯。对西方和美国来说，对俄外交的目标就是“让俄罗斯不再制造麻烦”。

最后，很可能是在普京达到部分目标，西方也达到部分目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妥协了。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认识清楚，延续以往的政策，那么我们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在中国和中亚的关系中，上海合作组织对很重要。但基于上合组织的中国-中亚互动更多集中在安全层面。经济考量尽管有，但体量不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西北边疆的外交政策很难实现以发展为主的大转型。另外要留意，土耳其的崛起会对我们的西北边疆造成很大的压力。往南亚看，现在的印度野心勃勃。我们必须注意中印关系的发展。近代以来，所谓“印度”的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自己争取的，而是英国人给的。印度建国之初，甘地、尼赫鲁等领导的政党都是家族性的政党，现在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能从一个区域性的政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党，我们绝不要小看他。在意识形态上，莫迪主张的印度民族主义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反华民族主义”两者的结合。因为对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很大的风险，所以莫迪动不动就会诉诸“反华民族主义”来强化执政合法性。

同时，印度的情况也反映出，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转型往往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我觉得印度对中国压力，倒不是来源于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而是印度内部制度性转型而导致的印度崛起。中印两个大国接壤，中国还是防御性的，很难在印度范围内有扩展性、发展型的外交空间。

所以，东盟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推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失去东盟；中国要保障地缘政治的安全，不能失去东盟。

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些年对东盟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之前蓬佩奥访问东南亚，动员东南亚国家跟着美国走。东盟还是做出了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集体决策。东盟一方面保持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一方面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这点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对东盟也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当美国强迫东盟选边站时，中国采取了“包容式的多边主义”和“开放式的多边主义”，为东盟国家保持中立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但从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来看，当美国、欧洲把战略重点从印度转移到东南亚以后，东盟这个平台会遭遇什么样的压力？我们要如何从东盟的角度看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南海问题怎么解决，按照以前的方式继

续，还是要换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的机制就足够了吗？我觉得，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考量。我们最近也在做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研究，发现实际上在现在美国和欧洲贸易战的情况下，3.0 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机制还不足以释放中国—东盟双边经济的活力。

研究界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和东盟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了一级学科，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要超越语言。光学语言很难研究东盟。我们更需要从社会科学的层面来研究东盟。东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华人。中国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在东盟国家，但是华人既可以成为我们对外联系的纽带，也可以成为我们外交犯错误的陷阱。华人和祖国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应从更复杂的角度予以考虑。我们不要觉得东南亚有华人，外交就可以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去推进。

希望我们的新一代研究者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展开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就中国—东盟关系看中国—东盟关系，已无法分析出问题的本质。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贸体系的重塑、意识形态之争等各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从而更接近东南亚的经济、政治现实。这也有助于我们出台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本文来源：东南亚学人**）